

给予国有经济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准确定位

《财贸经济》1999年第2期发表张卓元的文章说,这几年我们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和“抓大放小”中,常常因对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有不同认识而影响改革的进程。中共十五大依据邓小平理论,总结实践经验,给国有经济予比较准确的定位。我体会,其要点有四。(1)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3)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4)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些论述,使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可操作性更强。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目前主要包括:(1)资源垄断性行业,如原油、天然气开采、邮电、通信等;(2)提供最最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如铁路、民航、大型水利设施、城市公共交通、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等;(3)重要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关键领域,如钢铁、石化、粮食主要指商品粮流通、金融、外贸、尖端技术等,特别是其中的大型骨干企业;(4)其它特殊行业与企业,如军工、造币、航天等。

国有经济只要能控制上述四个方面,有人估计大约为1000家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公司),就能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就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扩大内需政策要与结构调整过程相适应

在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上,明显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用扩大内需政策来暂时缓解一下当前已经很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另一种倾向是使扩大内需政策与结构调整相适应,即一方面增加内需规模,另一方面,逐步使新的结构“瓶颈”消失,实现结构升级。我们认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放弃第一种倾向,而选择第二种倾向。原因是扩大内需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性任务,经济由“短缺”转变为“过剩”后,内需不足将是我们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扩大内需可以通过政府的“水平地”扩大投资或增加政府采购等措施来实现,这样做,可以一时地缓解内需的不足,并使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得到暂时的掩盖,但却不能解决长期内的内需不足问题和结

构“瓶颈”问题。

当前,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使扩大内需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有机结合: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减缓“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结构“瓶颈”;扩大内需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加快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政策与消费信贷政策结合,促进需求结构的升级,如政府为个人住房贷款提供更多的补贴,或对金融部门直接提供贴息或补贴,促进其为居民提供条件更优惠、范围更广的消费信贷服务;为因结构调整而下岗的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扩大再就业工程的政府支出等,对淘汰低效率的产业部门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摘自1999年3月10日《中国改革报》)

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要在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量力而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从1978—199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固定资产年度投资年均增长29.1%,全社会在建投资规模和年度投资规模均翻了三番以上。从1981—199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固定资产年度投资规模年均增长22.9%,在建总规模年均增长20%,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只有10.2%,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总规模增长速度分别快于GDP增长速度12.7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由1981年的19.8%上升到1995年的34.4%。投资率相对偏高,投资总量的过快增长,使我国投资总量的运行始终面临着规模膨胀的压力,

并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了国力允许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余地和空间受到严重的制约,一定要慎重而行。同时,投资膨胀率与消费膨胀相互促进,将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面临通胀压力,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据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年度投资增长率、投资率和在建规模增长率与零售物价上涨率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63、0.62、0.82,与国际相比,属高度相关关系。从经济的实际运行看,我国投资增长过快的年份,在下一年或稍微滞后的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现象。

(摘自《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2期)